

家長管教對青少年網上行爲及態度的影響

陸慧英

袁海球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資訊及科技教育部

周偉立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賴明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眾所周知，互聯網對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影響是好是壞至今還沒有定論。近期的研究顯示，影響的好壞取決於青少年的社會及心理調整，對此家長的管教起著甚麼作用？有關家長管教行爲對子女影響的研究不少，然而很少觸及互聯網或資訊科技的管教行爲、及它們對青少年網上行爲或態度的影響。本文報告一項包括 1,212 個隨機抽樣香港家庭的研究，探討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影響、及他們就互聯網有關的道德態度、以及它們與各類家長管教行爲的關係。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on Youth in Rela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Nancy LAW

Allan H.K. YUEN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tudies,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bert W.L. CHA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 LAI

Centr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hool and Teac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ternet is exert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many aspect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youth. While there is no common consensus on whether such influences are positive or otherwise, there is an emerging picture from accumulated research that the nature of the impact depends on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the youth concerned.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research on parenting behaviour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ldren and youth.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the area of Internet or IT-specific parenting behaviour, or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on youth in relation to Internet related behaviour or attitudes.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study conducted on a random sample of 1,212 families in Hong Kong, which examines the self-reported impact of Internet use and Internet-related ethical attitudes by youth and their possible relationships with general and IT-specific parenting behaviour.

一、資訊科技對青少年的影響

探討資訊科技對青少年影響的文獻大致可分為社會心理和道德觀念兩個重點，而就資訊科技對一般學習和工作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

1. 社會心理影響

隨著近十年互聯網的普及使用，資訊科技在社會生活擔演更重要的角色 (Dryer et al., 1999)。研究顯示資訊科技能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關係。在一個名為 HomeNet 的長期追蹤研究，Kraut et al. (1998) 發現人們愈多使用互聯網，社交圈子便變得愈小。互聯網的使用亦導致人們與家庭成員的溝通減少。Hallowell (1999) 認為線上友誼比實際能接觸的友誼更為局限，人們亦可能失去「人性時刻」(human moment)，因為只有兩人分享共同的物質空間，真實的心理接觸才變得可能。

研究發現 (如 Lea & Spears, 1995) 由於互聯網提供了匿名和空間分隔的溝通渠道，人們願意揭露自己的隱私，亦容易信任在網上給予幫助的人。可是假如在網上得到的是拒絕和負面的回應，便可能導致疏離感覺的增加和自我價值的降低 (McKenna & Bargh, 1998)。McKenna & Bargh (2000) 注意到人們可以在網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可能導致自我無法整合。此外，一些網上角色純粹是幻想的產物，若轉化成現實可能導致嚴重的問題。

雖然互聯網上建立的關係可能有上述的負面質素，一些研究員仍認為互聯網對人際關係有正面的影響。Kelly & McKillop (1996) 認為人們自揭秘密可以提升對自己生命的洞察力及自制力，繼而消滅壓力、抑鬱、和焦慮的感覺。McKenna & Bargh (2000) 亦認為互聯網上關係的質素並不差於真實關係，事實上它們會逐漸變成真實的關係。這些看法在美國的研究得到證實 (Fox, 2000; McKenna, 1998)。類似的結果亦出現於突破機構的一個本地研究，在使用互聯網之後，64% 的受訪者表示與朋友的接觸增加了，46% 的受訪者則與朋友的關係變得更好。此外，Wellman & Gulia (1999) 指出網上社群可以符合任何社群的定義，而資訊科技提供了革命性的溝通方法，建立及維持人們即時身體接觸範圍以外的重要社交關係。互聯網的匿名性質亦令拙於辭令的人更容易參與社交接觸 (McKenna, 1998)。

2. 有關互聯網的道德態度

全球電子通訊的急速發展亦帶來前所未有的濫用機會。電子通訊所提供相對匿名的溝通途徑令罪案和濫用變得較容易，犯案者或濫用者不用承受很高的風險 (Gordon, 1995)。線上的角色扮演遊戲為暴力罪行提供了在數碼空間重現的載體 (Kushner, 2002)。互聯網創造了嶄新形式的違法活動，例如未經許可而進入電腦系統、盜取資料作商業銷售、破壞或改變目標系統的數據、使用盜取的資料、及以盜用身分以獲取受害者的財產或權利。Siponen & Kajava (1997) 認為網上行為的社會道德問題有兩個重要的挑戰：不統一的道德標準、和缺乏對資訊科技的安全性和罪案的認知。Rogerson (1996) 認為公眾並不知道電腦道德的重要性，並提出犯案者的高智慧和受害者缺乏智慧是主要原因。入侵網絡和製造電腦病毒

被想像成天才兒童的嗜好。而由於受害機構害怕損害公司形象和揭露安全系統的漏洞，真實的電腦入侵數字應較公開報導的為高。正如 Siponen & Kajava (1997) 所說，電腦道德的事宜要求我們重新釐清我們的價值、理想、和對事物的次序排列。

以香港青少年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試者都不認同互聯網上的不道德行為，例如電郵炸彈、黑客、和色情資訊(香港小童群益會, 2000; HKFYG, 2000)。他們亦避免觸犯這些行為 (HKFYG, 2000)。然而大多數受試者認為在 ICQ 使用虛假資料來保護自己是可接受的，另外超過半數承認曾經使用虛假的資料 (HKFYG, 2000)。HKFYG (2000) 發現青少年的網上不當行為例如閱覽色情資訊、引用資料而沒有著明出處、及不適當的表達情緒方法，都和他們日常生活的相關行為很有關連。

3. 一些普遍的觀察

在一個香港進行的研究當中，Chau et al. (2000) 依據學生的心理調整（好與差）和互聯網使用量（高與低），界定了四個分類。擁有良好心理調整的高度使用者傾向以互聯網作為學習之用，較少用作結交朋友或用來解悶；心理調整較差的高度使用者則剛好相反，亦較傾向於網上使用真實的身分。該研究認為網上行為很大程度是使用者日常行為的延續。其他的研究發現富經驗的使用者花更多的時間學習新知識和娛樂，而不是從事網上的社交活動(香港小童群益會, 2000; HKFYG, 2000; Lau & Chau, 2000)。

二、資訊科技對家庭和管教行為的影響

家庭通常為青少年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最重要的環境因素。研究發現家長的管教行為對兒童或青少年的道德判斷培育 (Boyes, 1993; Parikh, 1980)、社會心理能力、學校成績、痛苦的內化、以及不當行為都有重要的影響(Lamborn et al., 1991; Maccoby, 1983; Steinberg, Elmen, & Mounts, 1989; Steinberg, Mounts, Lamborn, & Dornbusch, 1991)。

對很多家庭來說，伴隨資訊時代而來的大規模文化及經濟變遷改變了家的基本概念。家庭成員花在互聯網上的時間愈來愈多。家庭受到一系列電腦危險 (computer hazard) 的衝擊，例如電腦上癮、兒童接觸色情網頁、以及資訊過多。很多輔導員發現一些嚴重的家庭問題和互聯網有關(Oravec, 2000)。Turow(1999) 報告一個在美國進行的全國性互聯網與家庭的研究，涉及 1,102 個家長和他們起碼一個 8 至 17 歲的子女。研究發現雖然家長感到不安全，家庭仍是無可避免的爭相搭上互聯網。而有關公平和「數碼分化」(digital divide) 的問題是另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超過十年以前，DuDutton et al. (1989) 已發現在家中擁有起碼一部電腦是和較高的學歷、職位、和收入有顯著的正相關。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資訊科技令家庭變得更融合還是更疏離。Day et al. (1985) 及 Squire (1983) 認為家庭電腦有助增加家庭的凝聚，然而 Venkatesh & Vitalari (1987) 卻認為家庭的凝聚性會為之減低。兩方面的觀點各有證據支持。例如 Fox (2000) 發現九成有發電郵給家人的受試者表示電郵對他們的溝通有幫

助，四成認為互聯網令他們與家庭的關係更緊密。Parks & Robert(1998)及L'Abate(1999)探索家庭成員之間在網上建立的關係的質素，證實互聯網的環境能協助建立和支援這些關係。另一方面，青少年能通過互聯網接觸家長沒有留意或不許可的資訊。在很多家庭，家長和子女在電腦使用上各有很不相同的用途和模式，亦對何謂適當行為有很不同的標準(Lindlof, 1992)。而由於家長可能不懂得使用資訊科技，這對他們指導和監督子女構成更大的困難。

互聯網的降臨為家長管教帶來重大的挑戰。然而大多數文獻都只是研究一般性管教行為(general parenting)和它們的影響。本研究的重點正在於探討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行為(IT-specific parenting)、它們的影響、以及與一般性管教行為的關係。

管教行為的測量通常可以分為兩個類別：總體管教方式的量度，包括子女對一些量表的反應、或有關總體管教特徵的一般態度陳述；以及對管教行為的評估。Baumrind(1967, 1971)報告了三種管教模式：專制的(authoritarian)、權威的(authoritative)、和寬容的(permissive)家長。其後的研究(如Maccoby, 1983)提議一個以兩種管教維度(規管和支持)劃分，包含四類不同管教方式的模型。「規管」是家長對子女設定高標準要求的程度。「支持」則是家長接受和回應子女需要的程度。規管和支持結合起來便共有四類家庭：權威的(家長立場堅定，既規管亦支持)，專制的(家長嚴於規管而疏於支持)，寬容的(家長培育、接受，而避免作任何方面的規管)，和忽視的(家長既不規管也沒支持)。

雖然管教方式和管教行為是不同的概念，彼此卻很有關連(Darling & Steinberg, 1993)。Shek(1999)發現總體管教方式和管教行為的因子(factor)是相關的，並且在不同的受試者樣本和不同的時間取得一致的結果。本研究採用管教行為作為測量的工具，因為它能因應不同的環境或情況設計成相應的量表。

三、研究設計

這篇論文報告一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委託的研究，旨在探討互聯網對青少年和他們家庭的影響。它和其他本地相關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以家庭為分析的單位。在同一家庭搜集不同成員的數據資料，從而分析從家長/監護人及青少年的角度，資訊科技的使用如何影響青少年和他們與家庭的關係。

1. 取樣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9至24歲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家長/監護人。為了令研究結果更具代表性，研究人員採用取機抽樣的方法，從政府統計處的住宅資料抽取6,673個地址，其中656個無法使用(例如空置、已遷拆、不是家住用途、或地址不完整等)。在餘下的6,017個住宅當中，3,986個沒有合適的受訪者。在剩餘的2,031個住宅當中，成功訪問了1,212個兼有家長/監護人及他們9至24歲子女的家庭，回覆率為59.7%。而假如同地址共有兩個家庭，則只有其中一個被抽樣作為訪問對象。

每個家庭只選一個家長/監護人接受訪問，並作為受訪家庭的代表單位。因

此在 1,212 個家庭的樣本當中，共有 1,212 個家長參與研究，其中 458 人是男性、758 人是女性。受訪家庭的青少年則以年齡及工作情況作為分類。四組學生的年齡分別為：G1, 9-12; G2, 13-15; G3, 16-19; G4, 20-24；第五組（G5）則包括 16-24 歲的在職青年。共有 1,706 個介乎 9 至 24 歲的青少年接受訪問，包括 931 男和 775 女。由於青少年的數目多於家長，當需要研究家長選項和青少年選項的相關系數時，多於一個青少年的家庭都以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出一位青少年的數據用作分析之用。

2. 研究問卷

本研究採用的問卷是以過去量度青少年網上行為和態度的量表作為藍本，配以七次焦點團體（focus group）討論，搜集不同人士例如家長、青少年、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意見，修改並加上新的題目。正式訪問前，研究人員先進行前置研究（pilot study），以問卷訪問了 12 位大學生，確保用字皆為適當。

四、研究結果

1. 資訊科技對青少年的影響

問卷中有 14 項是用來了解資訊科技對青少年生活各方面產生了甚麼影響。利用 SPSS 進行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和 LISREL 進行的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都顯示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他們的影響共分為五個因子，分別為：增進知識（general knowledge）、娛樂（entertainment）、健康（health）、家庭關係（family relation）、及社交生活（social life）（見表一）。此五因子模型的 RMSEA=0.046, NNFI=0.92, CFI=0.94，文獻顯示 RMSEA<0.08, NNFI>0.9, CFI>0.9 皆為可以接受的因子結構。

表一：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自身影響的因子結構

增進知識	學業/工作 學習新知識 認識世界其他地方 認識本港社會及中國社會 和外國人溝通
娛樂	娛樂或消閒的選擇 娛樂或消閒的時間
健康	運動時間 身體健康狀況
家庭關係	和家人的溝通時間 和家人的關係
社交生活	和身邊朋友的關係 社交圈子的擴大或縮小 日常生活的方便或麻煩

數據顯示青少年認為資訊科技對增進知識影響最為正面（5.23），其次為社交生活（4.87）及娛樂（4.52），並皆顯著地大於七點量表（7-point scale）的中位數「4」。家庭關係的平均值（4.01）則和4沒顯著差異。健康的平均值（3.79）則顯著地小於4，顯示受訪者認為資訊科技對他們的健康有略為負面的影響。詳細的數字可參閱表二。

表二中的數字更顯示，以受訪青少年的年齡組別劃分，資訊科技對增進知識的正面影響以20-24歲組別為最高（5.46），而13-15歲組別為最低（5.09）。在娛樂方面，資訊科技對13-15歲組別的影響最大（4.67），而影響最小的則為20-24歲（4.36）和在職青年（4.29）兩個組別。資訊科技對各組別的健康影響皆略為負面，然而最年幼組別（9-12歲）的數值（3.85）顯著地高於其餘的組別，顯示他們所受健康方面的影響為最小。

表二：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自身影響的平均值

	青少年 (全體)	年齡組別				
		9-12	13-15	16-19	20-24	在職青年
資訊科技對自我的影響*						
增進知識	5.23	5.21	5.09	5.25	5.46	5.33
娛樂	4.52	4.52	4.67	4.60	4.36	4.29
健康	3.79	3.85	3.81	3.76	3.68	3.73
家庭關係	4.01	4.14	4.00	3.97	3.81	3.94
社交生活	4.87	4.72	5.00	4.99	4.92	4.79

* 1為「好大障礙」，4為「冇影響」，7為「好大幫助」

2. 與互聯網有關的青少年道德觀

本研究設計了11項問題以了解青少年對一些網上不良行為的接受程度。通過探索性和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青少年對網上行為的道德態度(Internet-specific ethical attitude)可分為五個因子：網絡入侵(net attack)、色情網頁(pornography)、粗言穢語(foul language)、虛假資料(fake information)、及盜版軟件(pirated software)(詳見表三)。此模型的RMSEA=0.053, NNFI=0.94, CFI=0.96。

表三：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爲接受程度的因子結構

網絡入侵
轉送電郵炸彈
轉送電腦病毒
色情網頁
觀看色情網頁
傳送色情網頁
粗言穢語
在網上使用粗言穢語
虛假資料
登記服務時使用虛假資料
在 ICQ 使用虛假資料
和他人溝通時使用虛假資料
盜版軟件
使用盜版軟件
下載軟件前不查證版權
在網上下載 MP3

表四詳列了各年齡組別就五類網上不良行爲的道德態度。除了 16-19 歲、20-24 歲及在職青年三個組別對盜版軟件的態度高於中位數「4」外，其餘的數值皆顯著地低於 4，顯示受訪者對各種網上不良行爲的態度皆為不接受。同時，除了虛假資料外，年紀愈小，平均值愈低，顯示愈不能接受這些行爲。而 9-15 歲少年對在網上提供真實個人資料有所保留，顯示他們對這方面可能導致的危險有所擔憂。

表四：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爲的道德態度平均值

	青少年 (全體)	年齡組別				
		9-12	13-15	16-19	20-24	在職青年
對網上不良行爲的道德態度						
*						
網絡入侵	2.47	2.21	2.63	2.69	2.49	2.43
色情網頁	2.74	2.02	2.49	3.32	3.30	3.33
粗言穢語	2.66	2.01	2.67	3.10	3.13	3.05
虛假資料	3.19	3.25	3.35	3.18	2.79	3.21
盜版軟件	3.67	2.65	3.81	4.24	4.49	4.19

* 1 為「非常不應該」，4 為「中立」，7 為「非常應該」。

3. 家長對青少年的一般管教行爲

受訪家長及青少年均需要回答一般性及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問題。就一般性管教 (general parenting) 方面，家長及子女的答案均出現與有關文獻論述相同的雙因子結構，該兩個因子可定義為規管 (demandingness) 及支持 (responsiveness)。表五開列了組成因子的各問卷項目。表六顯示，除了對在職青年的規管，各組別的兩個因子數值皆在統計上顯著大於 4，顯示香港家長普遍

採用權威式 (authoritative) 的管教方法，即對子女的言行有所支持並且有嚴格規管。有關文獻顯示，一般而言，權威式管教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正面關係，權威式管教下的青少年感覺孤單的程度亦較低，因此，被認為是最有效的管教模式。表六的結果同時顯示，家長對青少年的規管及支持皆隨著青少年的年齡遞增而下降。

表五：家長及青少年問卷中一般性管教項目的因子結構

家長	青少年
<p>規管</p> <p>你對他的朋友或同學有多少認識 你知不知道他放學後到了那裡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他在晚上離家後到了那裡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他空閒時做些甚麼</p>	<p>規管</p> <p>家長對你的朋友或同學有多少認識 家長知不知道你放學後到了那裡 家長有沒有主動了解你在晚上離家後到了那裡 家長有沒有主動了解你空閒時做些甚麼</p>
<p>支持</p> <p>當他做功課時遇到困難，家長最好能夠作出指導 如果他在功課上有不明白的地方，你會幫助他 你會主動關心他在校內的情況 如果他遇到困難，他會依賴你幫助他解決問題 無論他做甚麼，你都鼓勵他要做到最好 當你他想他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會解釋有關的原因</p>	<p>支持</p> <p>當你做功課時遇到困難，家長最好能夠作出指導 如果你在功課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家長會幫助你 家長會主動關心你在校內的情況 如果你遇到困難，你會依賴家長幫助你解決問題 無論你做甚麼，家長都鼓勵你要做到最好 當家長想你做一件事的時候，他會解釋有關的原因</p>

表六：家長及青少年就兩項家長一般性管教行為因子的平均值

	家長	青少年 (全體)	年齡組別				
			9-12	13-15	16-19	20-24	在職青年
一般性管教*							
規管	5.37	4.64	5.18	4.62	4.59	4.27	3.98
支持	5.42	4.67	5.27	4.63	4.42	4.22	4.19

* 1 代表規管度或支持度「極低」，4 為「一般」，7 為「極高」。

4.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家長管教行為

爲了更好了解家長在資訊科技有關範疇的管教行為，研究問卷中有十項是與子女使用資訊科技的管教行為有關，另有九項是家長對各類網上活動的鼓勵程度。經過因子分析，此兩類題目的因子結構是相互分開的，不能結合在一起，而前述十項管教行為亦可以分爲規管及支持兩個因子。從表七所開列的因子結構顯示，家長的支援行為皆與跟子女一同使用或討論資訊科技有關。經分析，有關家長對各類網上活動鼓勵程度的九項問題可分爲四個因子：學習或工作（做有關學業/工作的事情，學習新知識）、娛樂（下載遊戲或歌曲，瀏覽娛樂消閒資訊，玩網上遊戲）、社交（與本來相識的人交往，結識新朋友）和不道德用途（網上賭博，閱覽網上色情資訊）。

比較表六與表八數字，可以清楚看見家長在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行為跟他們

的一般性管教行為截然不同，無論是規管或支持方面的行為都大幅低於中位數「4」，而以支持性管教行為的跌幅最大。另一方面，家長對各網上行為鼓勵的四個因子，除了不道德用途外，數字都比相關的管教行為因子為高；亦即是說，在資訊科技日益重要的情況下，家長基本上是鼓勵青少年使用互聯網，亦認識到這對青少年學習、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管教方面卻流於放任自由，欠缺規管和支持。

表七：家長及青少年問卷中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項目因子結構

家長	青少年
<p>規管</p> <p>你對他的網友有多認識 你知不知道他在網上交談的內容 你知不知道他用電腦進行甚麼活動 你知不知道他上網觀看甚麼網頁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他上網時喜歡看甚麼網頁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他在網上和甚麼人交談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他和網友在網上或網絡以外的交往</p> <p>支持</p> <p>一同使用電腦做有關學業或工作的事情 一同使用電腦從事消閒或與生活有關的事情 一同討論有關電腦的問題</p>	<p>規管</p> <p>家長對你的網友有多認識 家長知不知道你在網上交談的內容 家長知不知道你用電腦進行甚麼活動 家長知不知道你上網觀看甚麼網頁 家長有沒有主動了解你上網時喜歡看甚麼網頁 家長有沒有主動了解你在網上和甚麼人交談 家長有沒有主動了解你和網友在網上或網絡以外的交往</p> <p>支持</p> <p>一同使用電腦做有關學業或工作的事情 一同使用電腦從事消閒或與生活有關的事情 一同討論有關電腦的問題</p>

表八：家長及青少年眼中家長就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行為因子的平均值及家長對子女各類網上行為的鼓勵程度

	家長	青少年 (全體)	年齡組別				
			9-12	13-15	16-19	20-24	在職青年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							
規管	3.09	2.88	3.74	2.89	2.61	2.20	2.05
支持	1.87	1.95	2.19	2.02	1.92	1.78	1.55
家長對各網上行為的鼓勵*							
學習或工作	5.96	5.53	5.94	5.59	5.47	5.34	4.95
娛樂	3.92	3.97	3.90	4.02	3.98	3.95	4.02
社交	3.74	3.79	3.63	3.77	3.87	3.80	3.96
不道德用途	1.24	1.57	1.18	1.50	1.65	1.75	2.13

* 1代表規管度、支持度或鼓勵程度「極低」，4為「一般」，7為「極高」。

5. 家長管教與青少年網上行爲及態度的關係

表九顯示一般性管教的規管和支持對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自身增進知識和家庭關係有正面的影響，而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則只對家庭關係有正面的影響。其餘娛樂、健康、和社交三方面，似乎都與家長的管教行爲沒有明顯的相關。就鼓勵行爲方面，家長愈鼓勵青少年使用互聯網學習或工作，則青少年愈覺得資訊科技能協助增進知識，亦對社交生活和娛樂消閒有正面的影響。

表十顯示家長管教行爲與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爲的態度的影響。就色情網頁、粗言穢語、和盜版軟件三方面，一般性的規管和支持，以及與資訊科技有關的規管都顯示負的相關，說明家長的管教行爲確能促使青少年較不接受這幾項網上不良行爲。就網絡入侵和虛假資料兩方面，家長管教的影響則不太明顯。而假如家長鼓勵青少年用互聯網作不道德用途，則青少年確會更爲接受虛假資料以外的四類網上不良行爲。相反假如家長鼓勵青少年用互聯網學習或工作，則青少年便較不接受上述的不良行爲。

表九：青少年眼中的家長管教行爲及對子女各類網上行爲的鼓勵程度與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自身影響間的相關係數

	青少年自覺資訊科技對自身的影響				
	增進知識	娛樂	健康	家庭關係	社交生活
一般性管教					
規管	.161**	.034	.080*	.163**	.036
支持	.192**	-.026	.055	.178**	.016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					
規管	-.058	.037	.058	.189**	-.006
支持	-.029	.014	.042	.163**	.040
家長對各網上行爲的鼓勵					
學習或工作	.288**	.124**	-.035	.076*	.187**
娛樂	.029	.048	.033	.095**	.060
社交	.100**	.022	.049	.068*	.087**
不道德用途	-.126**	-.038	-.031	-.031	-.076*

* p<.01; ** p<.001

表十：青少年眼中的家長管教行為及對子女各類網上行為的鼓勵程度與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為的道德態度間的相關係數

	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為的道德態度				
	網絡入侵	色情網頁	粗言穢語	虛假資料	盜版軟件
一般性管教					
規管	-.111**	-.156**	-.230**	.003	-.252**
支持	-.137**	-.175**	-.264**	.051	-.332**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					
規管	-.093*	-.216**	-.181**	.057	-.275**
支持	-.030	-.111**	-.085*	.127*	-.088*
家長對各網上行為的鼓勵					
學習或工作	-.090*	-.143**	-.185**	-.041	-.157**
娛樂	.125**	.031	.045	-.071	.066
社交	.089*	.087*	.065	.007	.034
不道德用途	.150**	.204**	.246**	.032	.201**

* $p < .01$; ** $p < .001$

綜合而言，家長的管教行為確能影響青少年對網上不良行為的態度。然而正如前述，家長在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行為數值偏低，這情況是令人憂慮的，因為放鬆管教的結果是青少年更傾向於接受那些網上不良行為。

除了量度青少年對各項網上不良行為的態度，本研究亦詢問他們有否參與那些不良行為。在所有 1,706 名青少年被訪者中，分別只有 33 人及 12 人承認曾寄發電郵炸彈及電腦病毒。338 人回答曾接收網上色情資訊，499 人回答曾在網上接觸粗言穢語。至於牽涉知識產權的問題，共 856 人承認曾使用盜版軟件，306 人曾使用未經授權的密碼來安裝軟件，796 人曾在網上下載 MP3 歌曲或圖片。結果顯示青少年曾參與的網上不良行為主要涉及版權方面，而一些較嚴重的行為例如發放電腦病毒，參與的人數極少。此外，把曾經參與和未曾參與上述行為的青少年分成兩組，再以 ANOVA 比較他們的家長管教行為，得出的結果跟家長管教與青少年對各項網上不良行為態度關係的結果極為相似，曾參與網上不良行為的青少年的家長管教較為寬鬆，家長亦傾向鼓勵他們從事互聯網的不道德用途，而不是用作學習或工作。換言之，放鬆管教不單導致青少年較容易接受網上的不良行為，亦可能導致他們實際參與那些行為。

6. 管教行為與家長的電腦知識

本研究亦發現家長的電腦知識與他們的管教行為有著正的關係，一般性規管和支持的係數分別為 $r=0.207$, $p<0.001$ 及 $r=0.200$, $p<0.001$ ，而與資訊科技有關的規管和支持的係數則更高，分別為 $r=0.312$, $p<0.001$ 及 $r=0.309$, $p<0.001$ 。表十一亦顯示家長的電腦知識愈高，便愈鼓勵子女使用互聯網作為學習或工作 ($r=0.132$, $p<0.001$)，而不是從事不道德用途 ($r = -0.114$, $p<0.001$)，與娛樂和社交的鼓勵則沒有顯著的相關。這說明採用較權威管教行為的家長亦較能掌握資訊科技。換了另一角度，亦可以說家長的電腦知識愈低，對子女的管教便愈不夠，尤其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亦較不鼓勵他們使用互聯網學習或工作。值得憂慮的是六成以上的家長 (796 人) 回答完全不懂得電腦，這亦導致管教的數字偏低。結果顯示家長的電腦知識和資訊科技能力有待提高，否則便不能對子女進行有效的管教。

表十一：家長電腦知識與家長管教行為及對子女各類網上行為的鼓勵程度的相關系數

	家長的電腦知識
一般性管教	
規管	.207**
支持	.200**
與資訊科技有關的管教	
規管	.312**
支持	.309**
家長對各網上行為的鼓勵	
學習或工作	.132**
娛樂	.050
社交	-.025
不道德用途	-.114**

* $p < .01$; ** $p < .001$

五、結語

互聯網為青少年帶來很多前所未有的學習、娛樂和社交的新途徑、新機會，亦帶來不可忽視的新誘惑、新的罪行、和新的接觸罪惡渠道。互聯網已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家長在這方面對子女的管教非常重要。本研究發現，互聯網對香港青少年的影響除了在健康方面以外，大致是正面的，而以對學習和工作的正面影響最大。另外，研究亦發現，香港家長對子女在資訊科技有關的規管和支持都非常少，這似乎跟他們的電腦知識和資訊科技能力偏低很有關係。研究同時發現，家長的一般性管教行為對子女在使用資訊科技方面都有正面的影響，如果家長能與子女共同使用或討論資訊科技，對子女的支持及正面影響最大。

參考文獻

- 香港小童群益會 (2000) : 《香港青少年網上行為及價值觀研究》。
-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 4(I, Pt. 2).
- Baumrind, D.B., A.E. (1967).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dimensions of competence in preschool boys and girls. *Child Development*, 38(2), 291-327.
- Boyes, M.C.A., S.G. (1993). Styles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moral reasoning in adolescence.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39, 551-570.
- Chau, A.W.L., Lau, I.Y.M., Chiu, C.Y., & Chu, C.Y.W. (2000).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and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Manuscript under preparation.
- Darling, N., & Steinberg, I.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487-496.
- Day, T., Bosworth, K., Gustafson, D.H., Chewning, B., & Hawkins, R. (1985). A computer system to help family members talk to one another.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8, 111-136.

- Dryer, D.C., Eisbach, C., & Ark, W.S. (1999). At what cost pervasive? A social computing view of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IBM Systems Journal*, 38(4), 652-676.
- Dutton, W.H., Sweet, P.L., & Rogers, E.M. (1989).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early diffusion of personal compu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7, 259-272.
- Fox, S. (2000). Trust and privacy online: why American want to rewrite the rules, The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
- Gordon, S. (1995).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crime: Shifting paradigms for the year 2000. *Computers and security*. Elsevier.
- Hallowell, E.M. (1999). The human moment at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58-66.
-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000). A study of youth values through their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Youth poll series 73.
- Kelly, A.N., & McKillop, K.J. (1996). Consequences of revealing personal secre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0(3), 450-465.
-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ophadhyay, T., & Scherlis, W.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9), 1017-1031.
- Kushner, D. (2002). Gangs in cyberspace. *Yahoo! Internet Life*, 54-57.
- L'Abate, L. (1999). Taking the bull by the horns: Beyond talk i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amily Journal*, 7, 206-221.
- Lamborn, S.D., Mounts, N.S., Steinberg, L. & Dornbusch, S.M. (1991).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2, 1049-1065.
- Lau, I.Y.M., & Chau, A.W.L. (2000). Attitude towards and use of Internet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Hong Kong Web Symposium*.
- Lea, M., & Spears, R. (1995). Love at the first byte? Buil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ver computer networks. In J.T. Woods, & S. Duck (Eds.), *Under-studied relationships: Off the beaten track* (pp.197-264). London: Sage.
- Lindlof, T.R. (1992). Computer tales: parents' discourse about technology and family.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0, 291-309.
- Maccoby, E.M.J.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E.M. Hetherington (Ed.),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Vol. 4, pp. 1-101). New York: Wiley.
- McKenna, K.Y.A. (1998). The computer that bind: Relationship 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University.
- McKenna, K.Y.A., & Bargh, J.A. (1998). Coming ou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demarginalization" through virtual group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3), 681-694.
- McKenna, K.Y.A., & Bargh, J.A. (2000). Plan 9 from cybersp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1), 57-75.
- Oravec, J.A. (2000). Internet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hazards: Perspectives for family counselling.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8(3), 209-324.
- Parikh, B. (1980). Development of moral judg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family

-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Indian and American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51, 1030-1039.
- Parks, M., & Roberts, L. (1998). "Making Moosic".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line and a comparison to their off-line counterpar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517-537.
- Rogerson, S. (1996). The ethics of comput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The Business Ethics Network News*, Issue 6.
- Shek, D.T.L. (1999). Assessment of global parenting style and specific parenting behavior in a Chinese context. *Psychologia*, 42, 69-79.
- Siponen, M.T., & Kajava, J. (1997). Computer ethics - The most vital social aspect of computing: some themes and issues concerning moral and ethical problems of IT. *Proceedings of IRIS 20*, August 9-12, 1997, University of Oslo.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i.uio.no/itis20/proceedings/12.htm>.
- Squire, S. (1983). Home life and the computer: better, worse or different? *Family Computing*, September, 18-20.
- Steinberg, L., Elmen, J. & Mounts, N. (1989).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psychosocial maturity and academic success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0, 1424-1436.
- Steinberg, L., Mounts, N., Lamborn, S. & Dornbusch, S. (1991).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cross various ecological nich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 19-36.
- Turow, J. (1999). The Internet and the family Report Series, No. 27. The 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Venkatesh, A., & Vitalari, N. (1987). A post-adoption analysis of computing in the hom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8, 1961-1980.
- Wellman, B., & Gulia, M. (1999). Net-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In B. Wellman (Ed.),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pp. 331-366). Colorado: Westview Press.